

# 后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境:董霖个案

肖守贤<sup>1</sup>,戴陵峰<sup>2</sup>

(1.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2. 江西泰和中学,江西 吉安 343700)

**摘要:**依据新发现的董霖在20世纪30年代数本译著及其编辑的两本刊物,分析了后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理调适过程。分析认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理论上进入训政时期,国民党人如何因应这一重大转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时为国民党基层普通党务人员的董霖,其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自我调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革命精神的衰退迫使像他这样曾经对革命事业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陷于革命之后的困境:他出于国家富强的固有目标对国民党的领袖尽力维护,对革命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的精神涣散和政治腐败深恶痛绝。

**关键词:**董霖;国民党;独裁统治;革命党;后革命时代;南京国民政府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104-07

1928年底,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实现了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目标。为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按照孙中山的理论,应告别军政,转入训政,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国民政府治下新军阀之间的政治争夺,内政呈现一片乱象。外侮则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变本加厉,而国民政府并没有令公众满意的对策。王造时甚至认为至20世纪30年代还不如袁世凯时期,他说:“回忆欧战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统一还名副其实。袁世凯的政治还像个样子。而结果犹不免于屈辱误国。现在的情形,比那时不知危急几千万倍,同时政治的腐败黑暗,分崩离析,也不知增加几千万倍。以这样的局面,去应付空前的绝大危机,其不幸也必矣。”<sup>[1]</sup>时人对中国外交软弱、内政荒疏的形象十分厌倦。这种内外交困的现象,尤其是民生凋敝,使某些学者对空谈民权亦感厌倦,杨公达即谓“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于民族民权民生,舍其两端,而取其中,焉知民不聊生,民权何贵?民族不存,权于何有?是故如今举国一致所企望者,

为如何复兴民族意识,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其他皆非所愿闻,亦无暇愿闻。”<sup>[2]</sup>对于执政不久的国民党而言,其政治治理面临重大挑战。此种困境反映在国民党内表现为普遍的党内焦虑和普通党员方向感模糊的困惑。本文即以一年轻的国民党党员董霖为分析对象,查考处于此种革命过渡时代的国民党人的心境及其思虑。

## 一、董霖思想的人生与政治际遇背景

董霖,字为公,江苏海门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公法学博士学位<sup>[3]</sup>。1933年,他在民选基础上当选为北平市参议会议长。不无遗憾的是,国内对其尚无专门的研究,即使在海外,董霖也只是以现代中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名义得到推崇,尤其是关于他在1950年以后在海外治国

收稿日期:2013-07-2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Q1108)

作者简介:肖守贤(1975-),男,江西吉安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际法方面的成就。其中重要的研究,当推凯卜仑、齐诺维斯(Mathilde Genovese)所撰写的《董霖教授对于世事的批判》。研究者对达到董霖政治生涯顶峰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思想及其作为鲜有发掘,一方面可能由于董霖是国民党党员,长期服务于国民党政府机构,1949 年后又离开大陆,这种隔阂的状况使大陆学界对其关注甚少;另一方面,对董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力度薄弱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资料上的缺乏(既有研究多关注董霖学术成就,乃因董霖相关著述在海外容易得到)。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董霖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英文著作,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sup>[4]</sup>,其中比较清晰地谈到了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线索,但是这些回忆录性质的资料只有简略的叙述,仍然比较单薄,不足以构成探讨董霖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资料基础。尽管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关注其学术成就,但也暗示其在政治上的贡献,顾维钧在 1977 年 3 月 12 日致董霖函称“阁下年未二十,即已参加革命,早岁宣力党政,既而襄赞外交,建树良多”<sup>[5]</sup>。曹文彦编著《中外学者评价董霖中国与国际问题论著》已经有所涉及,但受限于资料,仍然是浅尝辄止。笔者最近得以查阅到董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译著 6 种,并且首次使用董霖在北平编辑的两种刊物《现代月刊》与《求实月刊》,这些著作及刊物无疑是研究董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即以此基础,尝试通过对董霖此阶段的基本政治思

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分析,观察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党员在政治模式转变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调适的过程。

董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活动诚可谓“扬名之早,建树之速,罕有前例”<sup>[6]</sup>。1926 年董霖“经同学陈海波、杨幼炯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与中央及地方党政发生关系,共二十余年,直至 1950 年初,方能摆脱一切,专心在美从事研究及讲学生涯”,其革命生涯当在复旦学习期间开始,董霖自述“我于最后一学期,因为卷入革命浪潮,整日奔走于党务、学运以及学校行政”<sup>[6]</sup>。董霖在国民党内属于陈立夫的 CC 系,他的政治生涯的起点和发展都得到陈立夫的提携,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在地方上代表中央的 CC 系扩充影响,执行中央政府的意志。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党务,这点从表 1 不难看出。

这种长期从事实际党务工作的历练使董霖在分析中国当时面对的具体问题时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并渗透其思考问题的各个方面。如谈到 1934 年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时,他认为“所谓新生活者,并不在乎空谈理论,而贵乎身体力行”<sup>[7]</sup>。在编辑《求实月刊》时,编者即表明“本刊的使命是:第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寻求世界问题的因果及其解决的方法;第二,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在可能范围内指明今后革命的途径;第三,以忠实的态度研究各种思潮与主义及指正青年思想上的迷途”<sup>[8]</sup>。这种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取向同样

表 1 董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政治活动

任职时间		主要政治活动
1926 年~1928 年		在杨幼炯等介绍下加入国民党,此后在复旦大学从事革命工作,这一时期结识陈立夫、邵力子、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要人。
1928 年 6 月~1929 年夏		1928 年下半年在西安中山大学任教,后在西安主持国民党党务宣传工作,期间著《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什么是三民主义》两书,后因蒋、冯关系僵化离开西安。
1929 年夏~1930 年春		离开西安经北平赴南京,1929 年底应邀赴开封任党务及在大学教授党义。党务主要训练党员民众行使四权,党义课“听者藐藐”,后因韩复榘压迫返南京中央组织部赞襄编审。
1930 年暮春~1935 年	1930 年暮春 11 月	受陈果夫、余井塘命赴北平市党部任职;中原大战期间因特别市党部封闭短暂返南京后受特派秘密回北平;战后于 1930 年 10 月受派北平特别市党部五委员之一,复被推荐为宣传部长兼书记长。
	1931 年 5 月	当选北平市国民会议代表参加国民会议。
	1931 年 11 月	代表北平市党部出席国民党四大,1931 年底因对时局“灰心”辞党务职未获批准。
	1933 年 8 月~1934 年	任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从事北平地方自治。
	1935 年 6 月	根据“中日何梅协定”,国民党党部退出北平,回南京从事中政会议秘书事务。
1935 年 11 月		出席国民党五大,1936 年出国学习,此后虽偶尔担任外交职务,仍属清闲职务,未能从事实际政治。

注:根据董霖《六十载从政教学》制作。

可从他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编辑的《现代月刊》内容上可见一斑。

表 2 所列的文章中,有关当时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的文章占据绝大多数。所谓实际问题,标准难以统一,以表 2 而言,社会问题、各国经济社会状况以及现代设施批评等分类都可以算“实际问题”。《现代月刊》讨论实际问题的 40 篇,占文章总数的 56% 强;国际政治研究由于大部分涉及中日关系,自然是实际问题,关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文章居多,分别为 3 篇以及 13 篇,二者合计 16 篇之多,约占国际政治研究总篇数的 89%,几乎全部讨论实际问题了。只有社科知识偏重学理知识,占 18%,为数也不少。由此可见,这个时期董霖以关注民生、社会改造等实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为主,这使得他大大区别于当时谈论同样问题的诸多社会学者。作为从事国民党基层组织工作的革命青年,董霖这种注重从实际出发探讨解决问题之道的思路,也突出体现在他对国内外时局、党务问题的批评以及提出的解决措施上,以下即展开论述。

## 二、在两难中对党务之批评与回护

董霖参加国民党从事革命和党务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并不乐观,国内各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军事行动此起彼伏,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尤其是农村经济已经衰颓不堪,国际环境也十分恶劣,日本于 1928 年制造了济南惨案,此后情势每况愈下,两国军事冲突不断。1929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随即中苏在东北交恶。1933 年,董霖不无焦虑地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山先生从事三民主义革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民国成立,亦已二十二年。在这个时期中,成功之点,固然很多,但是革命的目的并未达到,较之苏俄革命的成绩,真是瞠乎其后;就是比较右倾的意大利之法

表 2 《现代月刊》全部文章分类统计

类别	国际政治研究	实际社会问题	社科知识介绍	各国经济社会状况	现代设施批评	合计
文章数目/篇	18	24	13	12	4	71

注:本表分类根据董霖在 1931 年 8 月 15 日《现代月刊》上“欢迎稿件”启事中所征稿件主要类别略加调整而制作。《现代月刊》上的类别有:现代国际政治之研究、实际社会问题之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之介绍、各国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之记载、现代设施之批评、文艺作品或随笔及漫画照片等。后两类本表不作统计。《现代月刊》的时间跨度为 1931 年 7 月 7 日至 1932 年 11 月 15 日。

西斯蒂的成功,亦望尘莫及。破坏多于建设,经济濒于破产,最近东北四省,又被强邻侵占,唇亡齿寒,华北亦岌岌可危”<sup>[8]</sup>。造成这种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董霖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革命失败之源。一方面,在 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国际政治之一切现象都是世界经济危机之必然的产物,都是资本主义列强企图脱离经济危机之失败的证明”<sup>[9]</sup>。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所致。列强在远东纵横捭阖,具体到中国,则是日本对华掠夺的逐步升级。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无不是这种国际形势的反映。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国内外各种统治阶级对于一般劳苦人民的掠夺,使着农村枯竭,市场缩小,以及一般经济产业日濒于最后倒闭的途中。外国之经济危机的出发点是在于工业生产之过度的提高,超过了市场所可能容纳的程度,中国经济危机的出发点则在于农村经济之极顶的破产,已经完全斩断了中国一般人民之购买能力”<sup>[10]</sup>。董霖尤其抨击国内军阀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大义称兵割据阻碍了国家的进步。他认为“自国民党奠都南京以后,先后如桂、阎、冯、唐,以及其它各次的叛乱,一直到近日察哈尔、方吉,两粤之各次的事变中,都表现着国民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治集体。无量数的封建军阀官僚反动派系都潜伏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以进行一切割据叛乱的活动”。声称“这些专以追求私人派系的军阀官僚分子,都是过去封建社会的余孽”<sup>[11]</sup>。并断言由于军阀混入革命队伍导致训政工作无法完成,因而“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即不能重用优秀的党员,反而优容军阀官僚”<sup>[6]</sup>。董霖分析国内外局势问题的角度和模式,和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国民党内部左派人物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点相近。而这种观点的形成也和整个时代对经济民主思考的大方向一致<sup>[7]</sup>。

董霖从自身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和感受出发,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尖锐地指出,北伐后期,国民政府出于国内外实际政治形势对地方实力派采取妥协措施,很多地方军阀实际掌控地方政权。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敢与一切对立的政敌作澈底的斗争,中央政府自很久以前对于全国政治生活都是采取着维持虚伪统一的政策。在虚伪统一之下,则国内各政治派系得以公开存在,公开发展”。而“这些专以追求私人派系的军阀官僚分子,都是过去封建社会的余孽,

他们在国民党的掩护之下,潜伏于国民党的组织之中,甚至列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以至国民政府委员之中,最先欲夺取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领导,在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便一变而为国民党政权之最大破坏者”<sup>[11]</sup>。若干年后,董霖在其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不幸当时各省掌握实权者有的仍带军阀气质,因见革命行将成功,随风转舵而入党。中央实行羁縻政策,委以党政重权,此类投机分子根本不明党义,惟恐人民有权,本身的地位难保,经常与党部摩擦,训政工作无法完成。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即不能重用优秀的党员,反而优容军阀官僚”<sup>[6]</sup>。董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貌似统一的中央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巨头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尤其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3人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起彼伏,使得董霖这样从事地方工作的党务人员感到失望和压抑。在最初参与国民革命时,他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富有献身精神。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越来越能从其文章和此后的回忆录中感受到失望情绪和压抑感。当董霖还在西安从事党务时,就感觉到党内的情形极不乐观:“各方负责领袖的彼此倾轧,演成党内重大分歧……一般民众对于连年党内文武领袖不能彼此容忍,为国效力,深感不满,我个人亦大为失望。”作为对党内教条宣传的一种抗议,董霖在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大上曾提案不必将三民主义等课程列为必修课,使学生自己和其他学科比较自身判断,尽管提案获得通过,但“嗣以国内战乱频仍,建国未成,而外患益深,青年对党大失所望,党义一课听者藐藐,收效极微”<sup>[6]</sup>。

在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和工作方面,董霖是积极的实行者。在西安、开封时期,由于地方实力派的掣肘以及服从于中央与地方派系斗争的需要,董霖多在宣传方面做工作。1930年董霖来北平后,他在党务建设方面的工作得以真正展开:主要从事宣传和组训工作,“党部的日常工作,除组、训、宣传及例行公事外,尚须参加无尽的会议,指导下级党部及民众团体的活动。联络新闻及教育界人士,经常与政治及军事当局洽商有关事宜”<sup>[6]</sup>。

党务实际工作经验使董霖能对国民党组织缺陷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和反省。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党内组织机构的缺点方面。当他在北平市党部任职时,即发觉党员之间互相倾轧拆台。董霖晚岁曾断言全国各级党部大都酝酿着内部的矛盾,而其原因除了个人对于权力的欲望外:“据我个人体验,许多

地方党部不能发挥充分作用,委员制实为主要原因之一。”<sup>[6]</sup>根据方宝珪的研究:“民国采用委员式政制,当从1918年孙中山南下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广州大元帅组织。国民政府采用委员政府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十六人为委员……自中央而省而市,均采用委员制。”<sup>[12]</sup>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也采取这种委员制作为各级党部领导机关的组织形式,名义上是发挥其集思广益的效能,实际为多头政治妥协的产物。董霖批评在委员制度下,“各委员权责平衡,相互牵制,结果彼此冲突,工作效率减低”。但是,在中央这个层级,委员制的流弊还不是很明显,原因在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表面上虽为委员制,但实际权力集中于少数领袖,尤以蒋、汪、胡的意见最被重视,因而尚无众论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当时省政府虽为委员制,但权力集中于主席,不至发生与党部同一流弊。”因为“省市市政府惟主席及市长之命是从”。“最大的弊病在地方党部,各委员处于平等地位,权责不易分清,彼此嫉妒牵制,分工而不能合作,遇事摩擦,成效欠著。”<sup>[6]</sup>

上述中央和地方角逐,中央内部巨头分裂以及地方党部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互相倾轧的现实,给初入政坛的董霖留下了十分负面的印象。这种治理失序的状况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界推崇独裁舆论的实际政治背景<sup>[13-15]</sup>。钱端升即认为当时的世界“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sup>[16]</sup>。出于对国民党领导涣散的失望,董霖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乃至前苏联的集权政治极其关注。董霖对“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上“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呼吁并不认可,与上述钱端升的看法相同,他认为应当强化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因而对法西斯主义有所辩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现代月刊》上,董霖夫妇首篇合作的文章即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介绍和评论。<sup>①</sup>这种对强力政治的关注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董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董霖出版的相关书籍得到反映。

① 佩萱,魏谷合译《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载《现代月刊》第1卷第6期,魏谷为董霖笔名。

从表 3 不难看出,除了他的妻子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合作》以及早期具有宣传性质的《什么是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外,其余都是有关德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的著译。而从 20 世纪 30 年代董霖夫妇<sup>①</sup>编辑的另外一份杂志《求实月刊》上的文章<sup>②</sup>统计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倾向(表 4)。

从表 4 文章统计来看,涉及德国的文章内容除了纯属时事的述评部分外,其他主要是介绍法西斯和希特勒以及当时世界独裁政治的进展状况。关于日本的文章主要是时事述评,这可视为是中日关系紧张的自然反映。此外,有关前苏联的文章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德国,且多正面介绍前苏联。而关于美国的文章极少,尤其未涉及美国的民主制度,显得尤有意味。不仅如此,由于 1931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影响,涉及美国的文章反而注意到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罗斯福总统采取的“法西斯”方法,<sup>③</sup>如果结合上述 20 世纪 30 年代董霖夫妇的著译来看,不难发现对具有集权意味政治治理方式的关注是董霖此时期的重要思想取向。

董霖对德国、意大利乃至前苏联持有某种程度的赞赏态度,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集权政治是当时的

表 3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董霖相关著作目录

作者	书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董霖	《什么是三民主义》	上海光明书局	1930
董霖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	上海光明书局	1930
董霖、佩萱	《墨索里尼传》(也作《墨索里尼自传》)	上海光明书局	1932
佩萱、董霖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也作《什么是法西斯蒂》)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2
佩萱	《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合作》	中国西北书局	1933
佩萱、董霖	《法西斯主义与新意大利》	上海黎明书局	1934
董霖、佩萱	《世界革命与苏联》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董霖、佩萱	《苏俄妇女》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注:本表根据《求实月刊》以及董霖《六十载从政教学》制作

表 4 《求实月刊》董霖主要文章分类统计

类别	国际问题						国内问题	
内容范围	德 国	日 本	苏 联	美 国	社科知识	其他	经济	政治
数量/篇	6	14	8	4	6	10	1	8

注:本表根据《求实月刊》制作。《求实月刊》的时间跨度为 1933 年 10 月 15 日~1935 年 6 月 1 日。

世界政治潮流。所谓“一般而言,民主政治盛行于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大战而后,各国为应付政治经济上之非常情势,非集权无以竟其功;是以今日世界政治潮流之所趋,又不足以希特勒氏病也”<sup>[17]</sup>。应说董霖此种判断并无偏差,魏斐德教授也指出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非常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sup>[6]</sup>。尽管董霖也认识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是“利用人民心理以转移他们对于国内政治失望的政策”。他的妻子佩萱认为日益扩展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缺点重重,难以赞同,但是又从消极方面说:“也有一些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必须想到法西斯运动所反抗的政治和经济的停滞情形是实在的。”<sup>[18]</sup>董霖甚至对前苏联的内政(经济方面)和外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封锁)不无同情之处。他认为前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地位根本转变,“主要地就在于苏俄自身经济建设之胜利,已使苏俄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得着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于是全世界列强都不能不重视苏俄的实力。”这种分析多少像是对此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衰弱的一种投射反应<sup>[9]</sup>。

但是,董霖对集权政治的某种赞赏态度显然是从工具与手段角度出发,而非价值角度的认可。实际上,董霖夫妇对宪政观念以及近代的人权思想持赞赏态度。其夫人在《民族主义与国联之三大失败》一文中强调:“许多年来,所有西方文化中之民族,经过无数的战争与革命,以求得到人民的较大的物质及精神的保障,较大的政治平等,较大的个人自由。”“这是在人类历史中,经过最大的挣扎而来的理想,而我们二十世纪的子孙,因为愚蠢与怯弱,有时因为疯狂的幻想之盲目的热诚,有时因为怯弱的屈服,而将它否认了,拒绝了,放弃了”<sup>[9]</sup>。董霖在 19 岁即加入中国国民党,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面对当时社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责难,董霖的看法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并不是一个永久的局面;换句话说,一党专政,并不是国民党建国的目的,而是一个

① 佩萱,名蒲耀璇,辛亥革命后四川都督蒲殿俊之女,燕京大学肄业,与董霖 1932 年结婚。由于两人经常合译著述文章,共同编辑杂志,其后亦同赴美留学,在思想上实为互相启发,故蒲氏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董霖之所思所想,为研究董氏不可缺少之资料。

② 董霖及其夫人文章统计以实际可以判断为准,笔名不确定者不列入。此外,期刊后附编者评论可视为董霖思想的反映,亦纳入统计;由于内容相关,同一篇文章可能被归纳到多个类别中。

③ 佩萱《法西斯蒂经济政策及美国工业复兴》,载《求实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3 年 12 月 15 日)。事实上,关于美国的 4 篇文章全部和美国经济有关,可见董霖关注美国的焦点在其强力复苏经济措施,而不在其民主制度。

手段;就是要用党治的手段,去达到民治的目的。孙中山先生定建国大纲的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 3 个时期,就是这个意思。再就这 3 个时期的本身来说,军政、训政两时期是手段,宪政时期才是目的”<sup>[19]</sup>。对于外界批评国民党独裁,他认为这是国民党鉴于国外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而采取革命方略,“先以武力扫荡障碍,继施训政,教导人民行使四权,终则颁布宪法,实现全民政治。换言之,中国民主政治实施之程序,必须经过军政及训政阶段,训政正所以为宪政之准备。外人间有不明此义,误认方法为目的,贸然批评中国非民主国家,此盖由于认识不足,观察未周,爰于此不惮反复说明,以见现阶段中国政治之实质,亦可从而预测其战后之动向也”<sup>[20]</sup>。最近亦有论者强调,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虽然钟情于德国政治的技术性方面,但是并无对德国纳粹价值的认可<sup>[21]</sup>。

董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和一般党务人员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应有不同,而自有其学理上的逻辑。他之所以能够将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一并接受,而不觉有何不妥,是基于对独裁政治和专制政治的不同判断。他认为“独裁政治(Dictatorship)是一种非合常规的、权宜的、过渡的政治手腕。专制政治(Despotism)则正是与这个相反的,它是存在于终极的、决定的、永续的意义之下。并且独裁政治与立宪政治可以并存,而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则完全立于反对的地位。独裁政治以非法的手段为基础,不受任何法律形式的约束,先由革命入手,起始着重破坏;它是被认为一种持久的革命,其目的在造出法律与秩序,这就是独裁政治的特点”。显然,作者是把独裁政治作为一种达成社会秩序的手段来看待:“虽然独裁政治所引起世界大战的机会较之其它政治所引起者更多,但独裁政治风行一世,不因此而稍减它的流行性,因独裁政治,是一个要达到革命的目的之过渡的办法,是救国家于危亡的简捷手段,所以在任何国家,独裁政治的过渡时代都不可免的。”作者对法西斯也不无警惕,认为“法西斯独裁,是反民意的强制性的资产阶级的独裁,它是反对议会政治的、法西斯主义之出现,是表现资产阶级独裁的一种新过程。它是自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推进下来得立宪资产阶级独裁,它是一种更发展更尖锐的资产阶级独裁。”<sup>[22]</sup>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代表全体民国国民的利益,董霖这里显然是从负面的角度使用“资产阶级”一词。

### 三、结 语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完成了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理论上它的党员也应该相应地随之完成从革命家到建设者的转变,以便从事后革命时代更为艰巨的国家建设。但是,随着大量所谓“南下的外来户”的北方政客“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职”时,即使是黄埔系出身的蒋系“天子门生”也有了革命胜利后的失落感<sup>[23]</sup>,遑论董霖这样没有黄埔背景的 CC 系年轻党员。个人出路的压力和政治理想的失落引发了持续的焦虑。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党务政治实践过程中,出于对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地方割据、中央分裂以及党务废弛等诸多弊端的需要,董霖在一定程度上对集权政治乃至法西斯式政治体制持赞赏姿态。尽管董霖不认为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认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实施步骤和制度安排。但是当他判断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不能归咎于主义,实际因人谋不减”<sup>[24]</sup>时,他对于法西斯体制潜在的对国民党党员的改造作用颇有期待。和那个时代参与独裁与民主争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至少在思想上,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独裁集权体制的认可是基于建立一个高效统一政府的追求,而非出于对满足一己之私的寡头政治的赞赏,更不是放弃民主对宪政价值的基本诉求。尽管董霖“常常自谦称为一个革命的失败者”(齐诺维斯(Mathilde Genovese)、凯卜仑《董霖教授对于世事的批判》)。就董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思想 and 实践而言,他的所言所思、他的时局分析具有典型革命家的特点——强调斗争,呼吁党派理想和个人道德热情。这些与其在从事实际政治建设乃至地方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干而不空谈党义,依据实际情况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并存不悖,这种革命家与建设者气质并存的现象,与其说是董霖个人的性格所致,毋宁说是作为长期作为革命性政党的国民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自身定位多歧的反映。

#### 参考文献:

- [1] 王造时. 荒谬集[M]. 上海:自由言论社,1935.
- [2] 杨公达. 对三中全会提案的一点意见[J]. 时代公论, 1932(1).

- [ 3 ] 徐友春. 民国人物大辞典[ M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 4 ] Tung, William L. Revolutionary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1926-1949 [ M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 [ 5 ] 董霖. 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顾维钧致董函[ M ].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
- [ 6 ] 董霖. 六十载从政讲学[ M ].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 [ 7 ] 董霖. 时事述评新生活运动[ J ]. 求实月刊, 1933, 1 (1).
- [ 8 ] 董霖. 关于本刊的几句话[ J ]. 求实月刊, 1933, 1 (4).
- [ 9 ] 董霖. 一九三三年国际形势之总结[ J ]. 求实月刊, 1933, 1 (4).
- [ 10 ] 董霖. 日趋紧迫的经济危机[ J ]. 求实月刊, 1933, 1 (5).
- [ 11 ] 董霖. 福建事变之面面观[ J ]. 求实月刊, 1933, 1 (3).
- [ 12 ] 方宝钐. 中国委员会政府制运动小史[ J ]. 求实月刊, 1933, 1 (7).
- [ 13 ] 邓丽兰. 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 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 14 ] 田湘波. 训政前期中国国民党党治与宪政问题争论综述[ J ].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3 (4):89-93.
- [ 15 ] 孙宏云. 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J ]. 社会科学研究, 2005 (1):128-134.
- [ 16 ] 钱瑞升. 民主政治乎? 极权国家乎? [ J ]. 东方杂志, 1934, 31 (1).
- [ 17 ] 董霖. 时事述评·德国独裁政治之猛进[ J ]. 求实月刊, 1933, 1 (5).
- [ 18 ] 佩萱. 法西斯主义之分析[ J ]. 求实月刊, 1933, 1 (5).
- [ 19 ] 董霖. 时事述评:宪法草案的修改[ J ]. 求实月刊, 1933, 1 (10).
- [ 20 ] 董霖. 中国宪法[ M ].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93.
- [ 21 ] Tator J. The generalissimo: China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 M ].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22 ] 董霖. 独裁政治的概念[ J ]. 求实月刊, 1933, 1 (1).
- [ 23 ] Wakeman F J. Spyn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 M ]. E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 24 ] 易劳逸. 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 [ M ]. 王建朗, 王贤知, 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 Revolutionary members' political mental state: a case study of DONG Lin

XIAO Shou-mao<sup>1</sup>, DAI Ling-feng<sup>2</sup>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Taihe Middle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e, Ji'an 343700, Jiang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wo newly discovered publication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ONG Lin in the 1930s,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ary members in post-revolutionary era. In 1927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theory, it entered a period of political tutelage but how Kuomintang would respond to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DONG Lin, as a common member of Kuomintang,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mental self-adjustment. The corruption within Kuomintang and the recess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forced revolutionary youths like DONG Lin, who were idealistic, into the plight. He aimed to build a rich and strong country. Thereby he supported the Kuomintang leaders and had a deep hatred for the distraction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within Kuomintang after revolution.

**Key words:** DONG Lin; Kuomintang; dictatorship; Revolutionary Party; post-revolution;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